



北朝研究



第二辑

于史学界，它是迄今为止第一种专事
北朝史研究的资料，于大同它可称得上—
项筚路蓝缕的事业。

殷宪 马志强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 朝 研 究

第二辑

殷 宪 马志强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朝研究·第二辑/殷宪,马志强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7

2008年5月重印

ISBN 978-7-5402-1398-5

I. 北... II. ①殷... ②马...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北朝时代-文集 IV. K239.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6157 号

责任编辑:里 功

封面设计:揽胜视觉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3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00 千字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前 言

《北朝研究》第二辑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平城北朝研究会和云冈石窟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北朝史暨云冈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作为首届中国大同云冈旅游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2000年8月14日至17日在北魏故都平城举行的“北朝史暨云冈学术研讨会”,虽然规模不算大,时间也不算长,但是开得很紧凑、很集中,学术气氛非常好。与会专家学者提交的数十篇论文既突出了北魏平城时代和云冈石窟文化,又从北朝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感到收入本书的论文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论文内容涉及面广,既有关于北朝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论著,又有宗教、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力作;既有对北朝历史的宏观方面的研究,如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政治发展的主线及分期》,又有对北朝历史的具体问题的考证,如张金龙先生的《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既有对考古新发现的初步探索,如王银田先生的《北魏明堂遗址再研究》,也有对已有文物古迹的深入研究,如王建舜先生的《论云冈石窟第7窟和第8窟的承上启下作用》。

其二是文章的论点大多比较新颖,多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创新,有所发现,如李元庆先生关于雁门文化圈的观点以及张敏先生关于北朝军队医疗抚恤制度的研究,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论前人之所未论。

其三是不少论文的作者不仅注重现有的文字资料的研究和利用,而且注重对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上面已经提到的张金龙先生和王银田先生的论文以及雷依群先生的《咸阳北周墓葬与隋唐制度》等,都是利用考古发掘所得,或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或纠正文字资料的错舛,显示出了这些作者丰厚的学术功底。

其四是在这些作者当中,既有年逾花甲学富五车的老专家、老教授,又有年富力强成就斐然的中年学者,更有初出茅庐功力不凡的青年学子,他们安于寂寞,甘守清贫,默默耕耘于北朝史研究的田野之上,这使我们看到了北朝史研究的未来,也是我们继 1999 年编辑出版《北朝研究》第一辑之后,之所以能够继续编辑出版第二辑的原因所在。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北朝研究》第二辑的编辑出版,推动北朝的研究向更深入更广泛的方面发展,并在不久的将来有《北朝研究》的第三辑、第四辑……与读者见面。

最后,我们还要向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长张增光先生和责任编辑里功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编 者

二 000 年十月

目 录

北魏平城时代政治发展的主线及分期	李 凭/1
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	张金龙/27
登国三年拓跋珪攻击松漠诸部的历史真相	任爱君/40
有关宣武帝时期经略益梁的几个问题	李文才/47
北魏时期的周边贸易述论	王万盈/64
关于五胡十六国北朝时代的“正统”王朝	
..... [日]川本芳昭 著 邓红 牟发松 译/77	
北朝军队医疗抚恤制度述论	张 敏/105
论高欢及其时代	徐美莉/115
从北齐废立皇后的冲突看北朝皇后的政治作用	
..... 周双林/134	
说周隋禅代	袁 刚/146
后赵高僧佛图澄	李智文/155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再研究	王银田/164
论云冈石窟第7窟和第8窟的承上启下作用	
..... 王建舜/179	
云冈石窟的调查概要	
..... [日]水野清一 长广敏雄 著 王雁卿 译/221	
十六国北朝时期草原文化与山东文化的冲突与合和	
..... 李红艳/228	
北朝文化·雁门文化刍议	
——研读苏秉琦先生有关考古学文化论著札记 ...	李元庆/247

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述评	牟发松/265
大冢·小冢 ——读李凭《北魏平城时代》	殷 宪/282
咸阳北周墓葬与隋唐制度	雷依群/286
北魏文人诗散论	童晓峰 陆晓春/294
庾信诗歌浅论	赵 晶/307
颜之推的文章学理论	韩 府/317
慧思指引智者往陈朝弘法动因考	赵剑敏/326
魏晋南北朝商贸风俗研究	张承宗 魏向东/336
魏晋南北朝并州地区少数民族初探	汪 波/362
魏晋南北朝私学教育内容多元化格局述论	陈 英/378
近五六年来北朝史研究概述	马志强/387

北魏平城时代政治发展的主线及分期

李 凭

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天兴元年(398年)至太和十八年(494年)是以平城为其统治中心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北魏平城政权,并将与之相应的时代称为北魏平城时代。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制约平城政权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平城时代政治的发展看上去异常地错综复杂。不过,在其中仍然能够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北魏皇权建立与发展的轨迹。在影响平城政权发展的诸种因素中,拓跋部落的继承遗俗与平城政权为了排除它们而推行的制度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组对立因素。由于这组对立因素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特别是由于它们对于北魏皇权的制约与反制约,使得北魏皇权建立与发展的轨迹,这条平城时代政治发展的主线,呈现为时起时伏的状态。也正是这条政治主线,牵动着整个平城政权,使它的发展途径呈现为迂回曲折的运动过程。

一、拓跋部落联盟的解体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拓跋部建立的代国。拓跋部首领猗卢于西晋永嘉四年(310年)被晋怀帝封为代公,拓跋部称代始于此时。^①不过,代国与十六国时期各游牧部落在中原建立的

^① 详见《魏书》卷一《序纪》穆帝(猗卢)三年(即西晋永嘉四年)条。穆帝八年(315年),晋愍帝进封猗卢为代王。



政权并不相同,与其说它是国家,毋宁说它只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唐长孺先生在《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中指出,“拓跋部落在猗卢统治时期开始形成国家,而完成于拓跋珪亦即道武帝的统治时期。”“我们认为拓跋建立国家的过程到(末代代王)什翼犍时大大地跨进了一步,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已具雏形的国家又夭折了。”^①笔者同意唐先生的上述看法。

西晋末的永嘉之乱以后,这个以拓跋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一直活跃在以黄河河套为中心的阴山山脉以南大草原上。当其势力强盛时,便屡次沿黄河东进到大同盆地,甚至南下到晋中一带。在末代代王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年)之际,前秦皇帝苻坚派遣大司马苻洛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大败拓跋部,然后将其所辖各部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分别划归独孤部首领刘库仁和铁弗部首领刘卫辰统领,从而灭亡了代国。此后十年之间,拓跋部落联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②

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败亡。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乘机而兴,于登国元年(386年)正月在牛川大会诸部,重建代国,他自己被推举为代王。^③新建的代国是被前秦灭亡的旧代国的再续,如同它的前身那样,虽然已具雏形的国家形式,但其本质仍然是部落联盟。^④因此,新代国成立以后,拓跋部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

① 该文收于唐长孺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② 详见《魏书》卷一《序纪》、卷二《太祖纪》、卷二十三《刘库仁传》、卷二十四《燕凤传》、卷九十五《铁弗刘虎附刘卫辰传》、《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③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戊申条。

④ 据《魏书》卷八十三上《贺讷传》载,“于是诸部大人请(贺)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贺)讷遂与诸人劝进。太祖(拓跋珪)登代王位于牛川。”从拓跋珪是在贺兰部帅贺讷为首的诸部首帅的推举下登上王位的事实可以看出,新建的代国本质上仍然是以拓跋部为首的草原诸部落的联盟。



的前途:要么,象祖辈那样,继续以部落联盟的形式驰骋在北方大草原上;要么,象在它之前进入中原的其他游牧部落那样,仿效中原地区的典章制度,建立起封建化的国家。曾经长期流落中原而深受汉文化熏陶的拓跋珪以及追随他的一批代国王室成员和贵族选择了后者^①,并因此与力图保持游牧部落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的部落贵族势力发生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登国年间持续了十来年的部落战争。^②

与征服草原各部落的战争相伴随,拓跋珪实行了有利于部落联盟解体和封建政权创建的离散诸部措施。关于离散诸部的问题,笔者曾经写过《北魏离散诸部问题考实》一文^③,探索了离散诸部的时间与范围、离散诸部的目的与对象、离散诸部的效果与影响等问题。

离散诸部措施并非孤立的法令,而是属于包括“分土定居”^④、“使役”^⑤等措施在内的一套综合性法令中的一项具体的措施;并且,它还是与拓跋珪推行的一系列农垦政策相配合地实施的。拓跋珪施行离散诸部措施的目的,是要剥夺那些陆续归附的异族部落酋帅对其部落的统领权力,从而将这些部落的部

① 详见拙文《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②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至十年条。

③ 拙文刊于《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④ “分土定居”见于《魏书》卷八十三上《贺讷传》。该传记载:“讷从太祖(拓跋珪)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⑤ “使役”见于《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该传记载:“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高车因为“粗犷”而“不任使役”,其部落才未被离散,可见被离散的部落是要供拓跋统治者“使役”的,至于“使役”的内容则不详。



民连同其酋帅在内,统统转变为拓跋新政权统治下的“编民”^①,并促使他们去从事农耕。但是,这样做不仅直接损害了异族部落贵族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违背了这些一贯从事游牧的各部落的旧俗,因而激起了他们的反复抗拒。由于异族部落的强烈抗拒,加上西燕、后燕两个慕容部政权的进攻,迫使离散诸部措施两度被迫中断。因此,与部落战争相伴随,离散诸部措施也断续推行了长达十年的时间才大体完成。

首次离散诸部的时间是登国元年,地点在盛乐。据《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条记载,这一年的二月,拓跋珪“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离散诸部是与“息众课农”政策相配合地实施的。但是,同纪同条又记载,西燕国主慕容永指使旧代国王室成员窟咄,勾结独孤部首领刘显进犯拓跋珪,引起“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当年八月拓跋珪不得不率部众逃往阴山以北。于是,这次离散诸部措施很快就流产了。第二次离散诸部是与登国九年(394年)由卫王拓跋仪主持进行的屯田相配合地实施的。^②这次离散诸部虽然只是在五原地区的一部分部落中施行,但其意义并不亚于第一次,它是拓跋部落联盟大规模地分化成为从事农业与继续游牧的两大部分的标志。与此相应,拓跋部的军队也增加了一项新的监督农业生产者的职能。不过,登国十年(395年)七月,后燕太子慕容宝率军北上,大举进攻北魏,深入

① “编民”见于《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该志记载:“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前注中所引《魏书》卷八十三上《贺讷传》有“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一句,其中“编户”一词的意义与《官氏志》中的“编民”雷同。不过,这里“编民”、“编户”的概念,与汉族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编户齐民是有差别的,因为在太和十年(486年)推行三长制以前,拓跋政权并无象汉族王朝那样完善的地方行政制度和基层政权机构。

②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九年三月条、卷十五《卫王仪传》、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到拓跋部的五原屯田区,第二次离散诸部也就此而中止。^①直到天兴元年,拓跋珪抓住灭亡后燕之后其统治下的各部落集中于大同盆地内的大好时机,才达到了全面离散诸部的目的。^②与这次离散诸部相应的是拓跋珪同时推行的“更选屯卫”和“计口受田”。^③其结果是,完成了将拓跋属下的各部落及从后燕旧地迁到大同盆地的各族徙民的农、牧分工,并将拓跋军队划分为从事征战与监督农业生产的两个部分。离散诸部以及与其相伴相随的“分土定居”、“更选屯卫”和“计口受田”等措施是这时期最具有积极意义的系列性改革。它促使拓跋部统治下的大部分游牧部落的组织分解,加速了这些部落的产业由游牧向农耕、半农耕转化和部落内部阶级分化的进程,从而彻底地破坏了旧的拓跋部落联盟的结构。

在我们明了拓跋珪推行离散诸部措施的过程以后,特别是注意到天兴元年全面推行离散诸部措施恰巧发生在下节要论述的平城政权建立的前夕,对它与拓跋珪建立北魏封建集权国家之间的因果关系就看得很清楚了。换言之,北魏封建集权国

①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十年七月条、卷十五《卫王仪传》、《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太元二十年七月条。

②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条、《资治通鉴》卷一一〇《晋纪》隆安二年条。

③ “更选屯卫”和“计口受田”均见于《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二月条下。但这两项措施的实施对象却不相同,它们分别针对以新旧来划分的两类人。“计口受田”针对的是灭燕战争后从太行山以东地区迁徙到大同盆地来的各族人民,即所谓的“内徙新民”,目的是令其安于农耕。“更选屯卫”这条措施以往不大引人注意,其实它的意义并不亚于有名的“计口受田”。它不是针对“新民”的措施,而是针对随同拓跋珪去中原作战后来到大同盆地的拓跋部众以及原来就大同盆地附近游牧的部落民的。他们相对于“新民”来说便是“旧民”了。“更选屯卫”的意思是,将部落民加以整编,使之按职能划分为“屯”和“卫”两个部分。所谓“屯”者,屯田也;所谓“卫”者,征战也。不过,经“更选屯卫”后的部落民并非单纯从事农耕,他们仍然顽强地保有着一定的畜牧经济。



家的初建正好是与拓跋珪大规模地离散诸部运动紧密衔接的。这种时间上的紧密衔接正说明离散诸部措施对于北魏封建集权国家的建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封建集权国家的建立

追溯登国元年至天兴元年间拓跋部的发展历程便不难看出,随着拓跋部在十年部落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以及此后对后燕决战的成功,随着离散诸部等措施的逐步推行,拓跋部首领拓跋珪的统治权力也在日益发展。登国元年三月,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两个月后,就向东南方发展他的势力,逼迫其主要敌手独孤部首领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并降服由奴真率领的独孤部余部。^①于是,当年四月,代王拓跋珪改称魏王,以表明他除旧布新和图谋“扫平中土”的强烈意愿。^②登国十一年(396年)三月,魏王拓跋珪迫使亲率大军来犯的后燕皇帝慕容垂败走、病亡,取得对后燕战争的关键胜利。于是,当年七月,他“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并改元皇始^③,这明确地表明了拓跋珪要建立封建体制的决心。但是,北魏大规模政治体制的改革则是两年以后才开始的,因为在“建天子旌旗”后的第二个月,拓跋珪就

①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条、卷二十三《刘库仁附刘显传》。

② 代王拓跋珪改称魏王的目的在于表明“扫平中土”的意愿,这在《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条中并未明确记载,但在同书天兴元年六月条中他与群臣议定国号时却说得很明确。后一条记载所收拓跋珪诏书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迹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③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皇始元年条、卷九十五《徒河慕容廆附慕容垂传》。

向后燕发动攻势了。^① 皇始二年(397年)十月,拓跋珪灭燕后,随后在第二年,即皇始三年(398年)的二月就全面施行了离散诸部措施。于是,当年六月,拓跋珪诏有司议定国号为魏;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就这样,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拓跋珪彻底地打破了旧的拓跋部落联盟的躯壳,初步建立了国家机器及相应典章制度。同年十二月,魏王拓跋珪称皇帝,改元天兴,是为北魏道武帝。^②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早在登国元年,拓跋珪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不是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而是封建的皇权了。只是由于不断地受到来自于内、外的压力,他的政治目标长期未能实现。直到天兴元年十二月,拓跋珪利用全面实施离散诸部措施的大好形势,凭借刚刚取得的灭亡后燕战争的胜利之威,依靠汉族士人的帮助,才达到了登上皇帝宝座的目的。不过,道武帝拓跋珪公然宣布实行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则是天兴三年(400年)十二月的事情。

在对异族游牧部落的征服和对后燕的征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道武帝还将大量北方草原和中原地区的民众陆续地迁徙到北魏新都平城的周围,使得京畿地区的人口陡增了一百五十万左右,一个以平城为中心的拓跋王朝蒸蒸日上地发展起来了。^③ 与

①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皇始元年八月条。

② 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条。

③ 详见拙文《拓跋珪与雁北的开发》,《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又见拙文《北魏时期雁北的城邑》,收于河东两京历史考察队编著的《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此同时,道武帝的权力欲望也达到了顶点,他于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颁布诏书,①曰:

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狷之徒,所以颠既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舛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敌随流,死而不悔,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微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後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欤!

在这道诏书之中,道武帝反复强调的是,北魏皇权乃“天人俱协”、“大运所钟”,是“不可以非望求”的。乍看起来,诏书的内容与历朝开国君主的腔调相仿,似无新鲜之处。但是,如果联想到道武帝十四年前在牛川被贺兰等部落酋帅们拥戴为代王的事实,再回过头来读这道诏书,一开头就声明的“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等语,我们就不难窥出其中的良苦用心了。原来,道武帝最担心的是那些拥戴过他的部落酋帅们追念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由此各自心存非份之想,或者

① 以下所载两段诏书均收录于《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三年十二月条下。



自身“不义而求非望”，或者拥戴他人称帝为王。看来，道武帝要用这道诏书表明自己坚守封建皇权的决心，他是绝不允许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死灰复燃的。

乙未诏书发布以后，道武帝仍觉得意犹未尽，因而次日即丙申日复又颁下诏书，曰：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息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阳德不畅，议发家陪，故衅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汉之弊，拾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共人。于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议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金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则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劾智，华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瓿郢家矣。故量已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辅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来者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

关于丙申诏书的用意，魏收在乙未诏书之下、丙申诏书之上称：

时太史屡奏天文错落，帝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已而



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

魏收所言确系实情，丙申诏书显然首先是针对“群下”的，因为道武帝在该诏书中明确地告诫他们，他们的职权是皇帝赐与的，因而“用之则重，舍之则轻”。

但是，丙申诏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只要将它与乙未诏书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乙未诏书重在解释君权神授而不可侵犯的道理，丙申诏书则要在阐述君臣天定而不可逾越的原则。二者的结合，正是内容完整地宣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原理的文告，其中心思想则是强调，以往部落联盟中的联盟首领与部落酋帅那样的关系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封建君臣关系。由此可知，乙未、丙申诏书并非仅仅是道武帝个人意志的简单表述，而是表达北魏王朝要坚定地实行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宣言。所以，结合前述道武帝任用崔玄伯、邓渊、董谧、晁崇等汉族士人制定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典章的统治制度来看，乙未、丙申两道诏书的颁布无疑就是将平城政权纳入封建专制轨道的标志。

总之，天兴三年，拓跋部的统治机器从部落联盟转化成了封建集权的国家。虽然这具封建集权机器还远不完善，但是在后来北魏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却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

三、由继承权引发的皇权危机

乙未、丙申两道诏书既是实行封建集权统治的宣言，又是开始镇压在内部反抗皇权的势力的信号。《魏书》卷二《太祖纪》在载录丙申诏书前称，该诏书是针对“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而发布的，此言虽不全面，但也道出了存在于北魏朝廷内部的激烈的矛盾斗争。《太祖纪》还在天赐六年（409年）条下称道武帝末年“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因而滥杀、滥黜臣